

商界

中国富人报告

他们有多少钱？他们的第一桶金从何处而来？在鲜花掌声、万人敬仰的背后又掩藏着多少辛酸血泪，艰难历程……

失败了，他们是怎样站起来的；成功了，他们又是怎样笑傲江湖？就此揭开一幅鲜活的富人生态图！



荣智健

许荣茂

孙广信

鲁冠球

陈丽华

刘永行、刘永好

叶立培

郭广昌

刘汉元

周正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界:中国富人报告/亦同编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

ISBN 7-225-02265-2

I. 商... II. 亦... III. 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662 号

商界:中国富人报告

亦同 编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 (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mm × 1192mm 1/16
印张 8
字数 26 万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书号: ISBN 7-225-02265-2/F · 96

定价: 14.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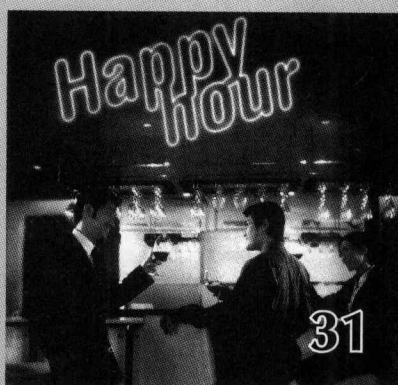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 01 第 **1** 章 中国富人调查
- 02 第一节 谁是富人
- 04 第二节 中国官方首次富人调查
- 08 第三节 调查高收入阶层
- 10 第四节 富人税收为什么不公开?



- 12 第 **2** 章 富人们的第一桶金
- 13 第一节 绝密档案:中国富豪第一桶金挖掘的九大方式
- 18 第二节 五位富豪吐露发家史
- 29 第三节 怎样成为百万富翁?



- 31 第 **3** 章 富人们的生活
- 32 第一节 撩开中国“雅皮士”的神秘面纱
- 34 第二节 新富人的生活真的纸醉金迷
- 36 第三节 富人摆阔的 N 种方式
- 40 第四节 探视中国“富人区”
- 45 第五节 地域富人的幸福时光
- 49 第六节 中国社会各收入阶层生活速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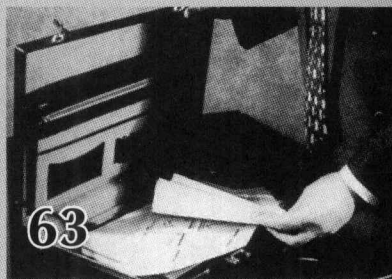
- 52 第 **4** 章 地产为王
- 53 第一节 许荣茂:上海滩的“地产大鳄”
- 55 第二节 孙广信:决胜三大战役
- 57 第三节 陈丽华:紫檀王国里的女当家
- 59 第四节 徐明: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 61 第五节 杨卓舒:辩证创富

63 第 5 章 资本高手

64 第一节 荣智健：“红色资本家”的接班人

66 第二节 刘氏兄弟：不仅仅是“饲料大王”

69 第三节 郭广昌：六大概念打造“复星”五朵金花



72 第 6 章 固守主业终成大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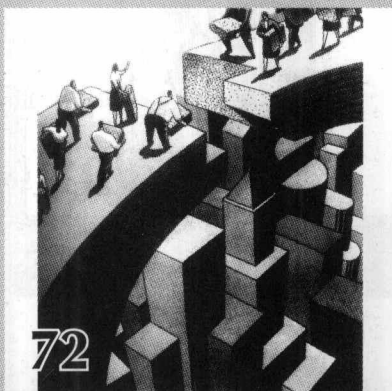
73 第一节 鲁冠球：业界常青树

76 第二节 左宗申：99% 做好并不算好

79 第三节 陶新康：尽显沪人精明的木业大王

81 第四节 张思民：像海王波塞冬一样主宰大海

83 第五节 明金星：做中国最知名的肉类品牌



87 第 7 章 另类富豪

88 第一节 三个红顶商人的十年

97 第二节 聚焦女富豪

100 第三节 低调的神秘大亨



106 第 8 章 中国富豪红黑榜

107 第一节 中国富豪今年是非多

108 第二节 尹明善：被总理看好的企业家

111 第三节 南存辉：努力创富，积极缴税

113 第四节 大陆第三富豪的陨落

115 第五节 禹作敏：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悲剧



附录一：福布斯 2002 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完整名单 1 - 100)

附录二：福布斯 2002 中国内地上榜富豪所担任公众职务

附录三：2002 落榜“福布斯”名单



第一章 中国富人调查





第一节 谁是富人?

谁是富人? 谁会成为富人? 当“知本家”“高级灰”“雅皮士”这些名词频频闪现,“富人”的概念却愈加模糊起来。人们总是隔着透明玻璃打量和想像着富人,关于富人的标准也是众说纷纭……

富人标准:

国家统计局——有房有车底线 3 万

富人的官方称谓是“高收入人群”。

2000 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进行了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样本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陕西、湖北、辽宁 10 个省市的 9956 户城市高收入家庭。

这次高收入群体调查最后得出的中国“富人标准”是:户均年收入 3 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虽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均年收入远远高于 3 万元的家庭。

调查还显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高收入群体的 31%,专业技术人员占 25.2%,自由职业者占 17.8%,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 9.5%,商业服务人员占 8.5%。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而不再是过去的地区、行业与工龄等。

这是目前由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惟一的高收入群体收入调查数据。

富人标准:

税务部门——年收入 6 万元以上

相对国家统计局而言,在税务部门眼里,富人(高收入个人)则是另一种标准。

去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个人所得税座谈会上,根据相关部门对广州、上海等城市所作的调查,税务专家们初步拟定了“高收入人群”标准:年收入在 6 万元以上。

事实上,究竟月(年)收入达到多少才算是高收入,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在国际上也没有“高收入标准”的先例。各地都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划定高收入标准的。

北京已经率先为“富人”定出标准。日前,北京市地税局首次明确了北京重点纳税人的界限: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有多处取得收入的或需要二次申报的人员及外籍人员为重点纳税人。

而据调查,目前北京市大约有 3 万人的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这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北京至少有 3 万富人。

但是,这些标准并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即使在税务系统内部,所谓“标准”也存在相当的争议。

有专家认为,对于高收入额的界定可采取两种方法:一、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年人均工资(2000 年为 15 600 元)的 10 倍以上作为高收入的标准,即年收入在 15 万元以上者为高收入人群;二、北京市个人所得税与月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为 1 000 元。换句话说,1 000 元作为个人月最低生活标准,那么,个人年均最低标准将为 12 000 元,若以此为基数,超过 10 倍以上的为高收入者。

依此计算,被税务部门锁定的“富人”年薪应该在 12 万~15 万元以上。

富人标准:

以年人均收入折算——10 万左右

每个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总是处于社会“收入金字塔”的最顶层。

据统计,全球 1% 富人收入占到社会全部收入的 60%。2001 年,中国 7 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 20% 的富人们占有 80% 的比例。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的曹子玮博士介绍,高收入的界定有绝对与相对两种标准,比如说按家庭资产或者年收入达 50 万元、100 万元来划分,这就是绝对标准;但是绝对标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收入高低的相对概念,如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高收入者。因此,收入调查中常常采取相对标准,前年的 10 城市高收入群体调查就是选取了 10% 这个相对标准。

根据这一相对标准(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再按照上述假设(富人的收入占到社会总收入的 80%),并结合最新的人均年收入情况,我们不妨折算一下“富人”的大致人均年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01 年只有广州、上海和北京三城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万元,其中,广州的为 14 694 元、上海 12 883 元、北京 11 578 元。按上述方式计算,各城市“富人”的年收入分别为 117 552 元、103 064 元、92 624 元。

尽管这样的计算很不规范,也谈不上科学,但可以大致看出三城市“富人”的年平均收入水平:10 万元左右。



富人标准：公众说法不一

大众眼中的“富人”标准是多少？100人就有100个答案。有记者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采访了不同收入的人群。有趣的是，收入越高的人，他们的富人标准中对精神财富越为看重。以下是他们的答案（按收入高低排列）。

北京

任先生（某集团总裁）：有人说，北京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就是富人，还有人说住1万元1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富人？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这样，北京早几年就有很多富人了。举美国的例子，1955年美国的蓝领占59%，现在占12%，就是说很多穷人都变成富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再依过去的标准划分贫富就不太科学。生活区域不一样，贫富标准也不一样。

冯先生（小公司老板，30岁）：有1000万以上资产才算得上是富人。试问，在北京，没有1000万，能买得起好车好房吗？连这些基本条件都满足不了，能叫富人吗？富人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事业，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了事业就有钱了。

赵小姐（某私企白领，年薪5万元，27岁）：富人的标准是有钱有时间。有钱没时间的，不叫富人；有时间没钱的，当然更不是富人了。富人的年收入起码在10万元以上。我不是富人，因为我仅有一点时间都拿去换钱了。

尚小姐（报纸发行员，年收入约2万元，22岁）：我认为富人的标准各个地方不一样，就我个人和北京来讲，1. 有车，至少是帕萨特，或者是公车开大奔！2. 有房，要在北城买的，至少三居以上。3. 夫妇月收入一定要过万。4. 平时家里不开伙，天天有饭局。大多数人距离富人太远了，但达到小康还是可能的。

上海

刘女士（有房无车，年薪10万元，职业经理人，40岁）：何谓富人？精神和物质皆富有之人才称为富人，我以为富人的标准是，其一，在精神上必须明白自己为何活着；其二，在物质上不必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累，具有为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支付其费用的能力。我认为我本人还未步入富人行列。

田小姐（某外企白领，年薪8万元，25岁）：富人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生活质量高，一切问题都能用钱来直接或间接解决。资产应该是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吧。

小马（自由撰稿人，年收入约5万元，26岁）：富人的标准是有车、有别墅，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只要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可以去做，实力强。钱多，从来不担心，不考虑，为了过得充实快乐而活着。

王小姐（在读研究生，24岁）：富人？至少收入在每年200万以上吧。

广州

蔡先生（某文化公司老总，28岁）：广州一般月薪超过1万就是有钱人。在广州，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应该不会超过1万人。“富人”应该有房子、车子，月收入在万元以上。

冯先生（某公司高级研究人员，年收入10万元，35岁）：富人应该有1亿元以上的现金和可变现资产，如果要等着年收入来过日子，肯定不是富人，有年薪的基本都是打工的。我看社会上只有很少人是富人，但现在有车有房的比例应该不低了。

朱先生（媒体人士，年收入8万元，27岁）：广州有钱人很多，二沙岛的别墅照样有人买，如果只是工薪阶层，工资再高也不可能成为富人。广州的富人都是老板，还有一些政府公务员。

吴先生（某公司部门经理，年薪5万元，28岁）：如果只是生活，我这个水平就算不错了，广州的普通生活消费不高，只是高档消费高。维持普通的生活，月薪3000元以上就是富人了。如果真在广州谈富人的话，怎么样也得有个500万吧，房子、车子就得几百万。

李先生（广告业务员，月底薪500元，23岁）：富人得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穿名牌，开名车，住豪宅。

深圳

张先生（某公司老总，只身闯荡深圳，现拥有2亿元资产，35岁）：或许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富人，但我自己没有多大的感觉，有时压力也会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可言，只要不在贫困线以下，大家似乎活得都不错。

胡太太（一家小公司老板的太太，32岁）：“富人”就应该是电影里的那种公子哥们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男的有靓女陪，女的有靓仔陪；或者一到黄金周就可以到处飞的那些人！还有那些歌星，听说深圳“6·28电话升八位明星演唱会”，四位天王级巨星一晚工作的个人所得税就纳了14.8万！上班族别说一年收入，即使两年也赚不到14万啊！

李先生（某电子公司营销人员，年薪6万元，27岁）：富人应该是年薪30万元以上，自有或公司配备小车（档次不限），小孩读名校，太太是全职太太，根本不用操心赚钱的事，房子在小区里面的就可以算作“富人”。

刘小姐（某通讯公司业务主管，年薪3万元，24岁）：富人应该是在深圳有房、有车、有闲情逸致的一类人，具体金钱数目难以界定，只要能做到“三有”，就是“富人”了！



第二节 中国官方首次富人调查

中国富人浮出水面

用有钱人或者富人这些中性词语来概括这次调查样本人群,并未显示出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因此有人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副总队长,也是此次调查的重要指挥者孟庆欣:

“如何为这一群体命名呢?资产阶级?中产阶级?”

“命名不是我们的事情,那应当由专家与学者来完成。”

所以,我们仍然只能用有钱人或者富人这样的中性词语来界定这一群体。

10年努力,让一个群体显形

31岁的博士曹子玮有很多机会离开国家机关,具体地说离开国家统计局,到外企去挣钱。外企的收入比他现在多得要用倍数来计算。但在国家统计局呆了近10年,曹子玮仍没有选择离开。他的理由是:在这里你能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而且有条件。

曹子玮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是真实地了解这个国家。而在国家统计局每年从事两三个重大的、全国性的调查,“你想想,这样干10年,你可以多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

最近令曹子玮兴奋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就是“中国10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这一调查是中国的第一次。“这个调查让我们弄清楚了很多问题,”曹子玮说。

这一调查于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广斌来说,来得就远不那么容易。程广斌1988年进入国家统计局,大约在1990年,他就提出要进行这一调查。当时提出这一调查项目,还只是从统计的科学性角度出发的。国家统计局一直在进行全国性的入户调查,每年都搞,但这样的调查了解不到高收入群体情况。“你想想,高收入的谁乐意每月记账,来配合你的调查呢?”为了解决得不到高收入群体资料的问题,就需要一次性调查来修正或者评估经常性调查的资料。一般国际上也是3~5年作一回一次性调查,得到修正系数或修正比例。

但是,1990年程广斌的要求没有被立项。

全国的经常性入户调查,一般要求是3.5万户,同时每年换1/3,3年换完。这样,每隔3年,就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也即15万户的全国性居民入户调

查,从中选出每年3.5万户经常性调查的家庭。程广斌提出进行高收入调查的1990年,正好完成了15万户全国大规模调查,没有立项的原因是没有专项经费。

此后程广斌并没有忘记这一专项调查的重要性。自己从事收入分配研究,但手里最缺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资料。对于这20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我们只能见到关于他们的典型资料,却没有群体调查数据。这无论从国家、社会,还是调查本身都是一种缺憾。”程广斌说,“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提出申请。”1999年,程广斌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

程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概括夙愿得偿:“这就像写字多年的人,终于看见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了。”

背景,从刺激消费开始

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陕西、湖北、辽宁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

从报道上看,2000年全国政协会议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扩大消费需求。有两位政协委员的发言被广泛地引用。肖谷欣委员认为,造成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广大消费者收入不高,且收入差距过大是主要因素。另一位政协委员贺铿认为: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是引起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贺铿的身份,他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他举例而言的是数据:我国现在将近6万亿元人民币储蓄存款,其中80%属于不到20%的储户。

在此次会议前,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调查发现:2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为992元;而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部总收入中仅占6.5%,户人均收入为124元。前者收入是后者收入的8倍。这一调查数据被最广泛引用。

“虽然贫富差别成为社会舆情,但我们对真正高收入者的了解有多少呢?”曹子玮问。

很显然,按照程广斌从统计科学性的角度看,我们真正到了需要有一次性专项调查来修正或者评估经常性调查的资料了。

曹子玮说这一过程来得很有趣。曹推导分析说:从9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市场疲软成为中国的一种现



实,由此有了对疲软原因的讨论;继而话语的主流进入钱集中在什么人手上的讨论。然后又进入这批有钱人是否对市场有拉动作用的讨论。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比较主流的倾向是:“有钱人不想花钱,无钱人想花钱却没有钱花”,然后贫富差别成了最主要的社会话题。这一社会热点话题在2000年全国的两会期间达到高潮。

为这一社会话题提供谈资的重要内容先是红歌星逃税,随后有着惊人收入的足球运动员种种出格举动,各种信息相混合,社会舆情因此而形成。

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第一次高收入群体调查与这种社会舆情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在这一背景下,这一专项调查势在必行。

并不容易的调查

谁是富人?什么标准算高收入?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碰见的首要问题。程广斌说高收入的界定有绝对与相对两种标准,比如说家庭资产或者年收入达50万元、100万元来划分,这就是绝对标准;但这种标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收入高低是相对概念,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是高收入者;而中国富人到了美国,却可能什么也算不上。这样他们就确定了以相对标准为此次调查的依据。最后经过计算,他们确定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高收入户的底线——即3.2万元,实际操作的标准是3万元。

程广斌说,我们的调查找不着高收入的源头,但我们选择了从收入的去向来确认,这样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又增添了有房有车这两项参照对象。这样,能够最后入围调查人数的样本由三部分构成:户均收入3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虽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收入远远高于3万元的家庭。

接下来的调查程序就是:进入高档住宅区、确定抽样间距、确定随机起点,然后开始入户调查。

不过,实际的操作远没有描述的这么轻松。程广斌说,进入高档住宅区首先碰到的麻烦不是保安不让进,或是即使最后终于入了户,遭到拒绝的情况也频频发生。程广斌说,北京市调查的拒访率甚至达到60%~70%。开始时,北京市60个调查员一星期的工作最后才拿回50个问卷,很多关键的数据都没有。为了这一调查,北京市先后换了四批调查员才完成。

事实上,这一专项调查的困难,操作者最初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他们将这一调查命名为“启动消费市场调查”,避免出现敏感的高收入等字眼,如果那

样,可能拒访率更高。

在全国性的调查开始之后,又有过一次争议,这是有关城市抽到了资产过亿的被调查者,像这样的异常值到底该不该进入统计之列?反对者的意见是,有一个这样的样本,一个城市的整体收入就都被抬高了,所以不应进入;而程广斌与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则认为,抽到这样的样本是正常的,当然应当进入统计样本。程说,“这才是从科学性准确性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后来达到的一个折中的方案是:当地统计可以不进入,而报到国家统计局则应当进入统计样本。

调查的价值与初步的结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强教授认为,高收入的全国性数据只可能由国家统计局来做。类似的调查,学者、商业调查机构也先后进行过,综合这所有的调查来思考这一现象可能更准确。不过,从国家机关首次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这一角度看,这次调查多少可以认为是一次有标志性的动作。

曹子玮坦陈,由于高收入群体非常特殊,我们的调查不能说非常精确,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代表了一种趋势。曹的“精确”的比较对象是经常性入户调查,高收入与这一调查相比,在精确性上就相应要弱一点。“不过,由于是第一次,”曹解释说,“如果我们的设计过于追求精确,那么将不容易操作,必须在这两者间寻找一种平衡。”

在程广斌看来,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在国外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过去是地区、行业与工龄。但这次调查显示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程度。但是,地区与行业的影响因素仍然存在。

曹子玮说从这一调查的数据看,我们过去对中国富人的想像可能部分要修正。将修正的地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过去想像里演艺界人士以及低文化人群会收入较高,但调查结果对此并未确认;

其二,在高收入群体职业构成上,专业技术人员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

其三,高收入比我们想像的要高。曹说,他先前估计高收入全国平均水平可能会达到年均3万~4万元,而现在年均却为6万~7万元;

其四,高收入的投资途径,没有我们想像的丰富,多数的投向是股票。曹分析说,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股票仍有超额利润,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其他投资渠道仍有问题。



中国人的富裕轨迹——市场化的结果

市场化的逐步展开,造就了中国一批批的富人,这是两条重合的轨迹。但是,真正面对富裕,可能还需要时间与勇气。关键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寻求起点公平,还是寻求终点公平?第二,是让穷人变富,还是让富人变穷?

在曹子玮看来,高收入者或者说富人的出现,是这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对于他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可以通过这一群体的变化来观察中国的制度变化;其二,可以依照中国的制度变化来考察这一群体的状况。

对曹子玮而言,中国人的富裕轨迹很清晰,简而言之,是“市场化的结果”。当然,“更严谨地看,我们所讨论的是城市里的中国人的富裕轨迹。”

曹子玮将他的市场化过程与结果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最主要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在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地获取了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但由于流通领域相对门槛较低,因此进入方便,所以,随后利润从极高迅速趋于平均。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但是,他们所积聚的原始资本,在未来转向新的行业与领域,开始促使这个国家积累新的财富。

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这一时期开始于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的动因。钢铁、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计划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这样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债务、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又诞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这一时期是在90年代初。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层次分别,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同时因为上市而衍生出的相关行业,如券商、会计、律师也因此获利;其次是上市资格的审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与前面的相关人士相比,股民在其间获利的比率最小,但却是他们浮出了水面成为富裕的象征。比如上海的股民杨百万。

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90年代中期的这一过程,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来得更为迅速。他们形成了中国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在曹子玮看来,前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是呈爆发式的,所以会很快就成为过去。而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由于门槛较高,将会有相当时间的持续。而这一领域也不唯科技,法律、医务、作家以及导演等领域现在正在、而未来会更多地产生富裕者。

不过,曹子玮还注意到在这四个阶段过程中,始终有三种人存在着富裕的机会:

其一,由于政策或者行业属性而形成的垄断者,如电信、电力与金融等机构;

其二,拥有资源者在权力寻租过程中形成了富裕。极而言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腐败,相比而言,由于惩处严厉,这两年这批人已渐减少;

其三,归国人员。

曹子玮在谈到为什么会有高收入群体调查时,已经推导过从拉动消费开始最后进入到贫富差别的讨论的过程,所以他比较担心这样的调查最后会产生歧义与误解。因此在他执笔写作的《城市高收入群体分析》一稿中,用两个疑问表达了他对理性看待高收入群体的希望。

这两个问题是:

第一,是寻求起点公平,还是寻求终点公平?这两种不同的公平选择将决定不同的社会分配方式。曹的结论是,“起点公平是我们追寻的目标,创建起点公平的竞争环境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二,是让穷人变富,还是让富人变穷?对这一问题,曹博士引用了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的一段名言:“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变贫富悬殊是重要,但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中国人富裕的秘密——制度外收入

从80年代中期的“创收”开始,中国人的收入不再单纯。曾湘泉发现,制度外收入现在差不多占到大多中国人收入的一半。这才是中国人富裕的真正秘密。但这种制度外的收入,最大的问题就是:规则没了。

曾湘泉教授承担的北京市“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市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对策研究,结果他的研究报告写成了: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

当我们坐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办公室,与这位院长用接近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讨论他的这项研



究后,我的结论是:曾湘泉这一研究完成了一项学术上的创建,但结果却使他的“对策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曾湘泉发现了什么?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收入特别是高收入的那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工资制度内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工资制度外的收入。这后一部分收入,“始于80年代中期,发展于90年代初期,膨胀于90年代中期,持续于90年代晚期”。这一“制度外”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收入分配制度成为中国人富裕的最大秘密。

曾推算,制度外的这部分收入,从80年代占到中国人收入的1/3,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半,在相当的部门和单位的个人收入分配中,占到主导地位。

但是,这一部分收入是没有进入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影响中国人30多年的工资制度,开始于1955年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级别、统一工资标准。第二年,全国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工资制度进行改革,然后形成30个级别的干部,对应于这些级别又配以各种水平的工资标准。致使其他的机构、团体和社会体系也以30级体系为标准模本而制定相应的工资标准。这一制度,此后30多年虽然经过几次调整,但一直保持了下来。

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一套30级的工资标准,其级与级之间的差距一直在缩小。有计算表明,1956年我国干部的最高与最低工薪的差距为31倍,次年即降为27倍,1959年又降至17.6倍,1985年降到10倍。

曾湘泉解释说,在80年代中期,随着工薪级差的缩小,已经显示出我们的工资制度有失效的迹象。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对其劳动报酬的支付,要有公平公正的前提。而我们如此之小差距的工薪收入,已无法体现劳动的真实价值。也在此时,制度外收入开始出现。

曾说,制度外收入的出现,始于政府为调动单位和个人积极性的“创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这一政策在工薪级差极小的现实下,对员工激励带来了重大效应。同时,这一政策也是国家为了解决中国人收入过低而采取的现实策略。

说到这里,曾停顿了他的逻辑推导与叙述,抒发了一些个人的感慨。

“这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运作轨迹,事实上就是制度外牵引!”曾说,“这构成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动力机制。”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曾不断地被电话被来人打断他的叙述。他说,我真想找一个安静地方写一本书,

书名就叫《制度外经济学》。

曾湘泉的“制度外”收入发现,给我们观察中国这十多年的变化提供了一种能够概括性地观察角度,但是这给他需完成的“北京市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对策研究”却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曾湘泉的研究仍然只能利用统计年鉴里的资料,换言之,按曾的发现,这只是制度内的收入,没有制度外的收入资料——而这一部分收入占到了相当人数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局面,曾的研究结论当然面临难题。因此,曾提出: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

制度外收入带给这个国家的困境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困境。曾说,“最大的问题是,规则没了!”如此一来,社会的整体性失范将不可避免。曾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借鉴美国的方式,每年3月,公民向国家申报个人的收入状况,无论制度内还是制度外都一并报了,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规范的体系。

其实将这一问题讨论到这一层面,曾湘泉说,他过去的结论——扩大“制度内”,缩小“制度外”——也许要重新思考。是制度内收入融入制度外,还是制度外最终进入制度内,也许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谁融入谁,我们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曾说,“而这种制度的建立,又有赖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中国人的贫富差别 ——第二次分配与家庭核心价值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强教授在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贫富问题的关注,他的第一本专著,即《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出版于1989年。

记者(以下简称“记”)如果借用基尼系数方法来观察中国贫富问题,我们目前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李强(以下简称“李”)用基尼系数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得小心谨慎。

记:为什么?

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因而计算基尼系数时应分为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的、城乡居民合计的三个方面。很显然,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会更高一些。

记:在你最近出版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一书中,我注意到你自己曾主持过两次大型调查来研究中国的贫富问题。

李:统计年鉴上的调查与统计,基本上只能得到被调查者制度内的收入状况,所以就必须要有关于制度外的收入调查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



记:城乡间的基尼系数?

李:就我统计与计算,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227,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003,而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77。

记:都超过了0.4!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中上等不平等了。

李:短短十几年时间,我们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种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记:在这种贫富差别里,应当还有更为复杂的中国特色吧?

李:在80年代末,我曾提出过一个理论,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的症结在于:群体外的差距过大,群体内的差距过小。也就是说,差距拉开主要在于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而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内部,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则还是平均主义盛行。

记:这是很真实的中国图景。

李:所以,中国的现状是差距过大与平均主义并行。

记: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在我们的市场化完成了初次分配后,我们应进入第二次分配,或更多次再分配。

记:第二次分配?

李:这是由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完成的再分配,这

样才能保证公平。

记:我们的税收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吗?

李:税收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不从事生产的政府职员收入,另一方面就是调节社会的贫富差别。形象地说,这是“收钱”的体制。同时,我们在调节社会贫富差别时还有“花钱”的体制,即失业、医疗、养老与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

记:无论是“收钱”还是“花钱”的体制,我们现在都还处在初级状态?

李:一个国家的社会税收与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是在国家具有相当财力后才逐渐形成的,而我们的社会变革是突发式的,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一过程。

记:在这种现实里,我们当如何选择?

李:中国的特色是家庭本位,这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

记:如何讲?

李:全国总工会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表明,失业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一是家庭,其次是朋友,第三是原单位,最后才是国家。

记:强调家庭本位,也就意味着我们度过现实的一种选择?

李:这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实际上能够起作用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强调中国的家庭核心价值,谁破坏家庭,谁就在破坏稳定。

第三节 调查高收入阶层

城市高收入群体谁挣得多?

知本家成老大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为5467元左右。其中,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脱颖而出,迅速致富,人均月收入逾万元,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佼佼者。

据分析,从学历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为11034元;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

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92元。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收入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靠资金而非劳动取得高收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12元。

从年龄角度看,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7%。该年龄段的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其次为40~5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1.3%。该年龄段的人经验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事业有成,收入较高而且稳定。排在第三位的是20~30岁的人。该年龄段的人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较新,年轻而且富有开拓精神,相当一部分人是IT业的从业人员。



城市高收入家庭钱投何处?

炒股是首选

统计资料显示, 9956 户城市高收入家庭 1999 年户均总收入为 109 702 元, 其中户均总收入为 5 万元以下的占 34.3%; 5 万~7 万元的占 27.4%; 7 万~10 万元的占 16.4%; 10 万~20 万元的占 12.6%; 20 万~50 万元的占 6.3%; 50 万~100 万元的占 2.2%; 100 万元以上的占 0.8%。无论是现有投资还是未来投资, 高收入家庭都把目标瞄准了股票。

调查结果显示: 有 26.2% 的高收入家庭将钱已投资于股票; 投资于商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占 16.1%; 投资国库券的占 8.4%。2000 年上半年职业股民的人均月收入 8491 元, 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列第二。列第一的是私营企业经营者, 人均月收入达 13 445 元。

高收入家庭的投资是社会民间投资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高收入家庭今年新增投资意向也显示: 有 16% 的高收入家庭准备向股票投资, 向商业和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为 6.1%。

城市高收入家庭如何消费?

买保险上名校 开靓车住豪宅

统计资料显示, 9 956 户城市高收入家庭拥有住房、汽车等高档消费品, 在购买保险、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钱。

1999 年所有高收入家庭平均寿险支出为 2 065 元, 财险支出为 1 185 元。其中, 购买保险的家庭占总样本的 49.3%, 购买保险的家庭平均寿险支出为 4 097 元, 财险支出为 2 405 元。

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年人均消费为 11 301 元。其中生活费用支出 4 183 元, 学习费用支出为 3 193 元, 择校费用支出为 3 925 元。在国有学校就学的比例占 89.1%, 在国外学校就学的比例占 3.4%, 在国内民办(私立)学校就学的比例占 7.5%。

调查显示, 高收入家庭百户拥有轿车 22 辆。其中有车家庭平均每户购车支出 19.95 万元。在有车家庭中, 拥有桑塔纳的占 26.4%, 奥拓占 12.9%, 富康占 9%, 夏利占 6.9%, 捷达占 3.9%, 别克占 2%, 奥迪占 1.9%, 红旗占 1.4%, 其他国产车占 19%, 进口车占 16.7%。

调查显示, 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户住房建筑面积达 111.3 平方米。居住样式为单元房一居室的占 4.2%, 单元房二居室的占 38.3%, 单元房三居室的占 41.9%, 单元房四居室及以上的占 11%, 花园式别墅

(单栋住宅)的占 4.7%。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户装修支出金额为 5.2 万元, 平均每户购房总金额为 21.8 万元。

2001 年, 25.6% 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买通讯设备(包括电脑), 19.9% 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买贵重家电, 14.4% 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买住宅(包括装修、家具), 12.8% 的高收入家庭准备购车。

谁在拿高薪?

北京市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队对北京高收入“白领”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 2000 年, 北京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达到 7 444 元。在接受调查的人中, 月收入最高的一位达到 14 984 元, 最低的一位为 3 500 元。

改革开放的 20 年来, 北京城镇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千万元的高收入群体逐渐形成。城市调查队的这份调查是在北京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按收入情况抽取的, 下限是家庭年户均可支配收入为 5 万元, 对城八区近千户高收入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

31~40 岁的挣钱最多

在高收入群体中, 以 50 岁以下的人居多, 占了总数的 90.5%。30 岁以下的占 24.9%, 30~40 岁的占 30.6%, 40~50 岁的人占 35%。从各个年龄组的收入来看, 30~40 岁组挣钱最多, 月人均收入达到 8 264 元, 其次是 40~50 岁组, 月人均收入达 7 656 元, 这两个年龄组占群体的 65.6%。

50 岁以下的人是这个群体的生力军, 他们集年龄、学识、业务专长诸多优势于一身。其中, 40 岁以下的知识含量最高; 高层管理人才最多的是 41~50 岁的年龄组; 科技含量最高的是 30 岁以下的年龄组。

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收入最高

硕士及以上学历者的收入在高收入人群中排名第一, 月人均收入达到 11 731 元; 本科学历者收入位居第二。从高收入群体学历构成来看, 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占总数的 61%, 其中大学本科占 29.8%, 硕士及以上占 3.6%, 高中(中专)学历占 33.1%, 初中及小学低学历所占比重均较低。

男性占绝大多数, 收入高于女性

北京的高收入群体中, 绝大部分为男性, 占 73%, 女性仅占 27%。从男女高收入者的具体职业及学历情况看, 双方在文化素质、专业技能方面均不相上下, 但是收入却有差距, 男性月人均收入为 7 707 元, 女性为 6 714 元, 两者的差额达到 993 元。

私营业主收入位居榜首

从高收入人群的职业排行中, 位居榜首的是私营企业经营者, 月收入达 14 984 元。其余, 依次是股份制



单位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三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

“知识+人才=资本”，集学识、专业技能、商业头脑于一身的专业人员成为高收入群体中最抢眼的一族。以法律专业人员为例，月人均收入达到14 333元，仅次于私营企业主，IT产业、信息产业等高科技、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者的收入也在增加。

收入最高的前20种职业排行为：私营企业经营管理者、法律专业人员、股份制企业负责人、导游、演员、职业股民、个体经营者、影视制作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其他自由职业者、事业单位负责人、证券业务人员、三资企业中方高级职员、IT行业从业者、卫生专业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购销人员、新闻出版文化工作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自由撰稿人。

官方圈点中国富人九大成因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邱晓华在2002

年曾对中国富人群体的成因作了历史性圈点。

邱晓华认为，中国富人主要有九大成因：

一是企业推行承包制，一批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

二是国家落实各项政策而得到一笔补偿资金所惠及的一批人；

三是国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先“下海”的人；

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的“双轨制”，特殊群体因此而享用了价差带来的6 000亿元财富；

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早涉足证券市场的投资人和证券从业人群；

六是房地产业投资人；

七是倒卖各种指标、出口配额等人群；

八是特殊职业者，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家等；

九是科技技术成果转让获益者。

第四节 富人税收为什么不公开？

孙雯在美国踢球，个人所得税率在40%以上；杰克逊在世界各地演出，每年他缴多少税，美国老百姓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英国女王的税单都列在报纸上面。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公众人物就不公开他们的税额呢？

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先生为此感到很理解。他说：“我经常看到各种报道，说税务干部如何辛苦，他们人手少，却要监督上百万应该纳税的人。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只知道他们自己长了眼睛，却忽略了成千上万双雪亮的眼睛呢？把歌星影星财富五百强的税收公之于众，让大家监督不是很好吗？”

据了解，全北京市有5 000多名税务干部，而纳税人是几百万。有记者在采访一些税收部门的时候，大多数税务干部都拒绝了记者的提问，他们认为新闻媒体无权知道他们辖区的公众人物缴税情况。一位曾接受媒体采访的公众人物明确地说：“我收入多少，上税多少，是我的隐私。”

经济学家韩德强认为：“财产并不只是个人财产，财富来自社会，是社会协作共同创造的。”他认为公众人物、财富英雄向社会公布其收入以及其所缴纳的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舆论监督。“据资料显示，1992年前美国公司几乎无需对公司管理层的收入作

披露，这样使得股东很难弄清楚管理人员到底拿多少钱，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既然没有透明度，管理人员就容易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做些手脚；二是股东无法看清公司的真面目，影响其投资决策。因而，1992年美国证交会修改了402款规则，要求注册公司的下列角色都必须披露其收入：(1)首席执行官。(2)前四位报酬最高的高级主管。(3)董事。但即使是这样，在美国仍有观点认为其披露不够。”

当然这种公开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美国富人也会想种种办法避税。但是他们的避税成本会增加很高。一位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创业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现在愿意回来投资办公司，因为我发现这里是富人的天堂。我想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做富人成本最低的国家了，没有人死死盯着你，而且无论你财产多少，是否经常上报纸上电视，大家都不会问你缴税了吗？好像你只要有钱成功，就已经够了，理所当然地接受公众的尊敬。而且富人总是最有话语权，他们很少受到质疑，大家都着急和你做朋友，甚至还有人给你献计献策帮助你逃税，以此获得你的好感。”“富人为什么不上税？”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说：“为什么媒体现在开始关注富人上税的问题？工薪阶层当然应该上税，他们是拿工资的，但是我们企业家不一样，谁给我们发工资



了？我一个人办公司，给多少人发薪水？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再说我的公司已经上了税，为什么我个人还应该上税呢？这个社会究竟是富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多？还是穷人创造的财富多？如果我赚得越多要缴的税越高，那我为什么还要干？”

经济学家韩德强先生指出“这是富人的歪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教授史际春也表示：“美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福尔摩斯曾讲到‘财产是法律的产物’，因而在税收问题上法治的建设亦更为迫切。”

史教授认为我国税法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总体上属地方税，不利于改进和规范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常因迁居、工作等的需要而在各省市之间移动，其所得来源于不同地区，故关于其所得资料的搜集至关重要。因此，课征工作宜由全国性的国家税务系统进行，以收实效。而在归属地方的情况下，则存在信息、管理等诸多问题的限制。譬如，一个人有来自北京的工薪收入、经营收入，来自海南的房屋租赁收入，来自广东的劳务收入，在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度下，如将其继续作为地方税势必会带来征管方面的巨大难题和征管漏洞，如其在海南、广东按20%预扣了税收，而最后综合税率却只有5%或10%，在北京怎么汇算退税，能不能汇算退税，都很成问题。而作为中央税或共享税由国税局系统征管，则能比较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综合课征无从设计，即使设计出来也将形同虚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徐孟洲也提到了监督的重要性。有关人士认为，征税问题、收入调节问题实际上是公众力量与利益集团反复斗争的过程。一方面公众力量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利益集团对财富的过分占有，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亦要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一过程的关键不仅在于财富的收入是否透明化，更重要的要依赖于公民的参与程度。

一位在网站工作的编辑说：“我不清楚为什么名人

的收入缴税状况要保密，而且税务部门好像很有义务替他们保守这个秘密。似乎只有偷税漏税的明星才会被惩罚性地曝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树立财富榜样的同时，树立纳税标兵呢？我觉得富人公众人物有很多特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时候我们批评西方的狗仔队，但是我们不了解西方的观念，他们认为这是成为公众人物的成本，因为没有人逼着你成为公众人物，而且成为公众人物当然有种种名利方面的好处，所以公众人物不能以隐私为借口拒绝社会的监督。但是在我们国家做公众人物相对就简单得多，只要你的股票在往上走，一般你就拥有了话语权，媒体总在表扬你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少质疑你的索取。”

资料：通行的几种避税方法

朱正一律师说，合理避税在美国亦是屡见不鲜的。一般来说，其中有以下几种途径。

高估成本。这种做法在国内尤其普遍，避税者将日常生活费用，小至铅笔，大至家电。统统打进公司成本中，而成本是不征税的。

捐赠基金。这种做法在国外屡见不鲜。例如财富500强中的很多公司每年会将大量的钱财投入到他们的基金会中，还有一些有名望的首席执行官也会热心于捐款。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捐赠基金就可以得到税收方面的减免。

购买艺术品。应该说避税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更高雅了。从梵高到达利，从青铜面具到雕塑，把应该纳税的钱用于收藏，这谁也说不出来。

高估广告费用。现代公司的运作中，广告费用占有较大成本比重。因而众多广告公司将广告费用高估，通过这种差额达到避税目的。甚至另建广告公司专门做本公司的广告，并且专门对本公司“高额收费”，而广告费又算在公司成本里不必交税。



第二章 富人们的第一桶金





第一节 绝密档案：中国富豪第一桶金挖掘的九大方式

中国富豪挖掘第一桶金的方法不下 50 种。以下 9 式最可为创业者活学活用。

第 1 式：做傍家

典型代表：王玉锁

第一桶金：人民币 1 000 元

可效仿指数：★☆☆

不仅新奥燃气的王玉锁，华桑燃气的沈家桑、UT 斯达康的吴鹰、亚信的丁健、田溯宁等都可视为其中的代表。前一段时间，东方集团的张宏伟也试图通过加盟吉通极力向这一目标靠拢。所谓做傍家，就是向垄断行业靠拢，做垄断行业的傍家。垄断饭最好吃，垄断行业的钱最好赚，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如果能吃上垄断饭，哪怕只是分享一点残羹冷饭，也胜过外面的鲍鱼燕窝。王玉锁、沈家桑在发家时所依傍的都是天然气行业，而吴鹰、丁健在发家时所依傍的都是电信行业。在中国，天然气和电信是由政府高度垄断的两大行业。想做这两大垄断行业的傍家，没有一点真本事是不行的。吴鹰的小灵通，一边遭到电信管理部门的查禁，一边在众多地方电信部门的配合下急速发展。从 UT 斯达康经常传出与电信管理部门相左的信息，最后又往往证明其信息正确，令人匪夷所思。此式手法可效仿指数仅为★☆☆（一星半，可仿效性较差），除非是自恃有什么特殊门道，此式手法建议创业者谨慎效仿。

王玉锁出生于河北霸州，三次高考落榜，从此放弃高考，开始做些小生意。王玉锁卖过葵花子、卖过啤酒，还卖过女用泡泡纱背心。王还做过一家塑料厂的业务员，但都没有赚到什么钱。1986 年春节，生意失败的王拿着 100 块钱，准备去租车跑运输，没想到到了地头人家又不许租车了。王在茫然之际，忽然想到倒腾天然气能赚钱，于是半途改道来到任丘。具体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王到任丘后先住下来，下午去街上闲转，看到有个蔬菜公司卖钢瓶，就问一个姓樊的老大姐有没有气，并且约好了晚上见面。晚上，王买了一兜子刚下来的杏，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找姓樊的大姐去了。一敲门，门开了，王一看就愣住了，原来是他救过的一个人。那人说：玉锁，你怎么过来了，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啊？王说，大哥，怎么是你们家？“大哥”说是呀。从此问题解决了。王也从此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哥”先让

王捡了一套设备回去，然后由“大哥”负责给王联系气。

王就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将设备拉回到老家，往自家小卖铺一放，贴了个告示：就这个东西，谁买，你先交 12 罐气的钱，10 块钱 1 罐，是 120 块。“我这个东西一套是 120 块。交 240 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实际我这个气是 1 次交 1 次钱，这样我不就多一些资金了吗？另外，再加上利润呢，那时一套挣 40 多块钱。”做饭烧天然气，那时候即使对于许多北京人来说也是有门路的象征，何况是在河北廊坊。王的告示贴出来，顾客立刻蜂拥而至，当时就登记了七、八套；几天时间王卖出去 40 多套，净赚 1 000 多元。这是王玉锁从天然气中掘到的第一桶金，以后王在“大哥”的帮助下，常跑任丘，瞅准天然气，“咬定青山不放松”，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中国有名的“燃气大王”和大富豪。

第 2 式：赌

典型代表：史玉柱

第一桶金：人民币 100 万元

可效仿指数：★★★★☆

身上有赌徒气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大批，但他们中间最大的赌徒是史玉柱。十几年来，史一直是中国经济界的风云人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 10 大富豪榜上，史还是惟一一位靠知识发家的富豪。史的老家在安徽怀远。1984 年史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至安徽省统计局。因工作出色，1986 年安徽统计局认为史人才难得，将其列入干部第三梯队送至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管理系读研究生，毕业回来即是稳稳的处级干部。一般人皆认为史官运亨通，前程似锦，但到深圳后开阔了眼界，同时为深圳“遍地金钱”所打动的史玉柱，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辞职。为此遭到了领导、亲人的一致反对，但史义无反顾，很快带着其在读研究生时开发的 M-6401 桌面文字处理系统返回深圳。重返深圳的史一贫如洗，只能借宿于深大学生宿舍，买不起电脑编写程序，便采用“瞒天过海”之手法冒充深圳大学学生混入学生计算机实验室，被管理人员发现驱逐后，史又通过熟人来到配置有电脑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他上班，天天苦干到凌晨。1989 年夏，史自认自己开发的 M-6401 桌面文字处理系统作为产品已经成熟，便用